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4.11.012

以塔为媒动态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郭建斌¹ 念鹏帆²

(1.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民族团结盟誓塔”是我国民族地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民族关系调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云南西盟“民族团结盟誓塔”的田野研究,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切入,考察“民族团结盟誓塔”作为一种媒介(或中介)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的动态实践过程。“民族团结盟誓塔”经历了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等三个传播过程。与之相关的实物传播、历史传承、建筑媒介、由誓及塔等媒介形态呈现出较为丰富的理论意义,且能与西方媒介学相关理论进行对话,进而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实践的理论价值。“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动态传播实践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在于,以塔为媒“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塔以载道“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塔盟誓“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理论表达对于激活我国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团结盟誓塔;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盟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4)11-0107-11

基金项目:2024年度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云南案例调查研究——以云南西盟民族团结盟誓塔为例”、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十四五时期涉滇舆情案例分析与治理研究”(YB2022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建斌(1969-),男,云南普洱人,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志传播研究、湾区传播;念鹏帆(1991-),男,云南陆良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民族学、政治传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虽然2014年起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法在学界日渐兴起,不过,云南阿佤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却始于更早之前。本文从阿佤山“民族团结盟誓塔”案例的经验材料入手,围绕“民族团结盟誓塔”所表现出来的媒介特征,分析经由“民族团结盟誓

塔”形成的动态传播过程,进而对“民族团结盟誓塔”展开传播学思考。

1951年1月21日,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西盟”)佛殿山垭口的大草地上举行了“阿(佤)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赴京参加新中国国庆一周年观礼并出席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的拉勐、李保等人,与西盟当地的各部落头人、进步人士和各

族群众代表共 3000 多人参加大会,史称“三千人大会”。与会人员在这块大草地上举行了泡水酒、剽牛、盟誓活动,参加会议的各民族头人、进步人士和县、区领导每人抬了一块石头摞在一起,大家摞起来的石头,形成了石塔,后被称为“民族团结盟誓塔”。^①如今,在距离西盟老县城勐卡镇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新建的“民族团结盟誓塔”,紧挨着“民族团结盟誓塔”的还有西盟佛殿山佛房遗址、革命烈士陵园、佤山天池。七十多年来,“民族团结盟誓塔”经历风雨沧桑、几多变幻,现已成为阿佤山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象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西盟并存着保甲制、土司制及部落头人制政权,各有势力范围,其中佤族部落头人制的区域最大。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关系等种种原因,西盟佤族“与其他民族的联系交往较少,社会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1]1-2}随后,党和政府从西盟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发放救济物资、疏通民族关系、调解民族纠纷,不搞土地改革,没有划分阶级,培养民族干部,引导西盟“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飞跃。在笔者看来,“民族团结盟誓塔”是西盟阿佤山各族人民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感恩中国共产党的最为直接的表征。

近年,社会各界关于“民族团结盟誓塔”的研究与讨论呈现持续升温的态势,党史、文学、媒体等领域对“民族团结盟誓塔”多有关注,政府官员、文人墨客、新闻记者对“民族团结盟誓塔”的相关讨论较多,相应的政策话语、文学话语、媒体话语较为丰富,其关注大多散见于文化史料、诗词歌赋及新闻报道等。^②相较而言,关于“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基于学理层面的讨论尚显薄弱。并且,既往的相关讨论,更多地是基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特定意义来进行的,过多地关注于“民族团结盟誓塔”的表征意义,忽略作为媒介(或中介)的“盟誓塔”本身的意义,从而看不到其作为一种媒介(或中介)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的动态实践过

程。这正是本文欲对其进行传播学阐释的主要考量。据此,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做出如下追问:“民族团结盟誓塔”从建立到当下的发展变化过程,到底具有怎样的传播学意义?围绕这一中国本土媒介实践的个案探讨,对于深入认识、理解中国某个少数民族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这一特定个案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何现实启示?



图1 “民族团结盟誓塔”位置关系图(2021)^③

一、作为媒介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及其传播过程考察

(一) 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

盟誓在我国佤族聚居区(以西盟与沧源为中心)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据史料记载,明末将领李定国与佤族、傣族盟誓:佤、汉、傣三家要信守盟约、精诚团结、世代相好,有违盟者要罚交出“龙首之马三匹,金角之牛三头”。^{[2]55}清代曾被封任西盟、勐梭土司的李通明,对佤族、拉祜族聚居的西盟山,采取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为了和佤族窝朗头人搞好合作关系,有利于巩固统治,他先后和佤族各部落头人在佛殿山歃血为盟,订立盟约。^{[3]196}1934年5月,李希哲和胡玉山共同商议,决定派副官张万美、军务官李仕相率队到公明山驻守。到达指定地点后,他们召集叶烈、甘塞、官仲、塔田、绍兴(今缅甸佤邦境内)、班老、班洪等15个佤族部落头人及代表,剽牛盟誓,表示团结联合抗击英军。^④

盟誓由“盟”和“誓”两部分组成。“盟”,《说文解字》云:“《周礼》曰:国有疑则盟,诸侯再相与会,十二岁一盟。北面诏天之司慎、司命。盟,杀牲歃血,朱盘玉敦,以立牛耳,从明从血”;^{[4]141}“誓”,《说文解字》云:“誓,约束也,从言折声”。^{[4]52}“盟”“誓”连用,即用言语起誓,通常以神灵、性命、人格、具体物件立下誓言,进而形成约束行为。但“盟”与“誓”并不相同,《礼记》中记载:“约信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

用言辞相约束以为信也。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5]¹⁴⁰“誓是当着神灵及众人的面许下的承诺,它往往带有某种绝对命令的味道,多用于表示个人决心。盟则在仪式上更加隆重,它要用牲,即歃血之誓,多用于诸侯之间的缔约”。^[6]“誓”从言,“言”从口,从盟誓的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观之,盟誓是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口头传播活动,通过“言”带动“行”,通过“行”促进“言”,实现“言”“行”互补。简而言之,盟誓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口语形式,以面对面的方式,通俗易懂地传达信息、传播观念、传递思想,并对人的行为形成约束。据有关学者考证,佤族剽牛盟誓誓词一般有“对天发誓”“天打雷劈”“断子绝孙”等词句,盟誓之后,佤族会恪守誓词,外化为遵守行为。^[7]

“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高潮是 3000 多人在石塔前庄严宣誓:“佤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永远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8]佤山盟誓以口语作为媒介,借助地方方言及形体与体态语进行信息的传播和感情的传递,在大会召开过程中,以极大的感染力将在场的各民族同胞拢在一起。其实早在正式盟誓之前,佤族头人拉勐就对在场的人说:“只要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阿佤山人民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藤子拴着的葫芦(电灯)会像太阳一样地发光,钱多得像树叶一样”,^[9]⁸类似的口语表达带动了与会群众的情绪,推动“民族团结盟誓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成,盟誓行为也得以尽快发生。口头传播以其零距离的优势、喜闻乐见的形式、别具特色的风格成为人类社会早期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长期的封闭严重延阻了西盟佤族的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西盟佤族仍处在结绳记事、掐草计数、树叶信、鸡毛信的原始信息传播状态,在大众传播媒介尚未普及之前,相较其他信息传播方式,口语仍然是阿佤人民重要的媒介之一。佤山盟誓很好地体现了口头传播的特点与特色,而且与平常的口头传播活动不同的是,“歃血盟誓”是通过号召参会人员立言来约束各自的行为。

(二)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

自古以来,阿佤人民就有“实物记事”的传

统,“佤族没有文字,他们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最初,佤族和汉族同时得到了文字。汉族的祖先把文字写在纸上,因而能流传下来。佤族的祖先把文字写在了牛皮上,后来肚子饿了,那张写着字的牛皮便被吃掉了,因此佤族没有文字,之后,他们在遇到需要记载和表达时,就只能用木刻和实物”,^[10]²¹⁷至于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节日的记录,石头经常被用作记事的工具。1950 年 12 月底,云南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要用“佤族理”的“喝咒水”“剽牛”仪式来表达各民族团结一心跟党走的心愿,拉勐不仅给予积极支持,还提议要用大石头把“咒语”(誓词)镌刻在上面,^[11]²²³表示各民族团结一家,永不变心,此举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时至今日,西盟佤山仍然保留着对石头记事的偏爱与喜好,如今走进西盟县城,依然可以看到“西盟公约”“共产党怎样说,阿佤人民怎样做”“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为畏缩”等大量石刻景观。

当然,石头作为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工具,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佤族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石头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头作为记载信息的工具却不经常被人提及,金石学者对石刻碑碣饶有兴趣,但多止步于著录考证、证经补史,专门将石头视为媒介的研究少之又少。20 世纪中期,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对石头的媒介属性展开过十分具体的讨论,指出“石头是艺术家和文化表达的永恒媒介”,^[12]¹³⁸作为媒介的石头逐步进入传播研究的领地。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研究也发现“字母表刻在黏土或石头上是一回事,书写在莎草纸上又是另一回事”,^[13]¹⁹⁵石头的媒介属性也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体现,其媒介功能不断彰显。德布雷(Régis Debray)更是直截了当地讲,“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等记录和储存的物理载体”^[14]³⁸也可视为媒介。从伊尼斯、麦克卢汉及德布雷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来看,石头作为载体记录事迹是石头成为媒介的重要证据,甚至可以确定地讲,将石头视为媒介的讨论在学理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石塔是塔的一种常见类型,用石头建塔,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整个塔体完全由石头雕刻或砌筑而成,二是配合其他材料,石头多用来建

造塔基和塔座”。^{[15]19}1951年1月21日,佤族代表拉勐、拉祜族代表李保(因其来自西盟“力所”乡,误填为“傣傣”族)等人并未选择使用“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阿佤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而是通过更为简单的“栽石头”的方式,每人拾一块石头,放在一起、摞在一起、垒在一起,共同建成了一座石砌的“民族团结盟誓塔”。“栽石头是表示我们与佤族团结友好,佤山各民族、各部落间也要团结友好,谁以后若背约,就惩以与所栽石头等重的黄金、白银。”^{[11]64}在“垒石成塔”过程中,石头具有媒介意涵,“民族团结盟誓塔”也具有媒介意涵。至于将塔视为媒介的讨论,伊尼斯直言不讳“金字塔也是一种媒介”,^{[12]77}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亦有言“塔楼总能确定和宣布一个点,随后所有其他事情都得围绕这一点运转”^{[16]252}。“垒石成塔”不仅是坚硬的原材料“石头”变成牢固的成品“石塔”的过程,也是“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媒介化过程,“石头”与“石塔”作为具体的实物媒介,协同形成“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实物传播过程,传递着“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与价值精神。

(三)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

1951年1月,参加“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人员每人拿一块石头,放在一起,垒成石塔,形成“垒石盟誓塔”,大约一米多高,接近成年人腰部位置。1951年5月,流窜至缅甸的200多名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了上千名地霸武装攻陷了当时的西盟区政府,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对盟誓塔进行了破坏,试图抹掉各民族团结一心跟共产党走的历史证物。“文化大革命”期间,盟誓塔屡遭破坏。1980年代以后,西盟县按照文物保护办法及相关史料,修复了盟誓塔,垒成了一座长5米、宽4米、高3米、3层结构的石塔,并作为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佛殿山三佛祖佛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保存下来。2021年6月,西盟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原遗址附近复建盟誓塔,新建的盟誓塔成为新时代阿佤山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信念之塔。^⑤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建成的“民族团结盟誓塔”相比,除建塔的具体方式略有不同外,2021年新垒成的塔塔身鲜明刻有“民族团结盟誓塔”的红色字样,醒目耀眼的汉文字是用现代化的刻字

机刻成的。

既然已经有“塔”作证,为何还要立“字”为据?“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7]124-125}从中国古人的相关表述来看,文字可以成为保存、传达和记忆历史文化的一种媒介。西盟县佤族文化研究会会长岩峰对本文作者这样解释道:“以前的盟誓塔都没有文字,更多是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之物而存在,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垒石盟誓的精神,标记那段历史,增加盟誓塔的辨识度,所以刻了文字。”^⑥2021年,在新建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左上侧立有石头,石头上刻有“民族团结誓词”的字样,“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民族团结盟誓塔”右上侧立有石头,石头上刻有“盟誓塔誓词”的字样,“我们佤山各族人民,要像垒起的石头紧紧凝在一起,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共产党怎样说,阿佤人民怎样做,一心一意,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此誓”。“民族团结盟誓塔”七个鲜艳醒目的红色文字镌刻于塔身,与“民族团结誓词”“盟誓塔誓词”等文字内容共同形成“民族团结盟誓塔”的文字传播过程,标明了盟誓行为,打破了空间限制,使盟誓精神传至远方。

二、“民族团结盟誓塔”的传播学阐释

(一)实物传播: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的过渡地带

从人类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等前后相连的四个阶段。据传统新闻传播史考证,从口语产生至文字发明的漫长历史时期,人类传播活动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口头传统,这一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就是语言。口头传播有着十分明显的优点,方便简单,通俗易懂,直接明了。口头传播的缺点也很明显,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转瞬即逝,保存性差。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生产生活内容日渐丰富,信息传播活动更加频繁,口头传播的局限性逐渐凸显,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传递信息,文字及书写材料相继出现,使得人类传播进入文字传播时代。从

国外学者伊尼斯、施拉姆、麦克卢汉和国内学者黄旦、郭庆光、李彬的相关研究来看,人类传播从口头传播转向文字传播,似乎是不言自明且毋庸置疑的,那么,口语传播与文字传播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中间地带?

就本文的传播旅行而言,“民族团结盟誓塔”先后经历了“歃血盟誓”“垒石成塔”“勒字于塔”三个传播过程,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并未直接转向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而是经历了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更进一步讲,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过程与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过程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区域——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换言之,口头传播转向文字传播,其间经历了实物传播的阶段。所谓实物传播,是指在口语出现之后、文字尚未到来之前,人类通过具体的实物来实现信息传播的过程。实物传播^[18]在学界并非没有讨论过,而是说,在既往的学术讨论中,不少学者直接把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口头传播推向文字传播,缺少对实物传播的充分讨论,为数不多的实物传播研究,仅仅停留在研究概述、概念辨析及理论思辨层面,缺乏实证研究。“民族团结盟誓塔”案例为我们重新理解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线索,以石头及石塔为代表的实物是人类传播活动史上口头传播通向文字传播的基本形态。这也表明,在人类社会早期,在口头传播至文字传播之间还存在着一片宽阔的过渡地带——实物传播阶段,即用实物作为媒介进行信息的传播,这样的传播形态及传播实践,在人类传播史上同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建筑媒介:物质实存与精神赓续的交汇空间

石头曾经一度是阿佤山生产生活中十分坚硬的物质。如前所述,原材料“石头”及成品“民族团结盟誓塔”均属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媒介。阿佤人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栽石头”的媒介化形式,意图通过石头及石塔的不朽来表明“团结一心永远跟党走,海枯石烂心永不”的信心和决心。“民族团结盟誓塔”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建筑媒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承载着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文化。人们通过他们所创造和存储的东西来进行更新换

代,这些“纪念性物质通过代与代之之间的对话重新编织了事物间的所属关系”,建立成纪念性建筑物,“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要使事物形成群体,产生某个地方,使其得以延续”。^{[14]27-28}阿佤人民以传统而有效的传播方式,以“民族团结盟誓塔”作为最佳传播载体,传递“团结一心跟党走”的精神密码,坚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想信念,并将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在本文的讨论中,“民族团结盟誓塔”不再只是历史的物质实存,其附着的“盟誓精神”已经内化成为西盟佤山各族人民的情感依附、精神力量及共同追求,经由媒介化过程,“民族团结盟誓塔”的传播属性从物质实存转向精神赓续,“对塔盟誓”的传播活动亦构筑起物质实存与精神赓续的交汇空间。如今,每年农历正月初九,西盟及周边澜沧、孟连的群众都会自发地在这里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抚今追昔,遥忆当年。每逢重大节日,西盟还会在这里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重温佤山盟誓的誓言,去纪念一个伟大的时刻。因此,“民族团结盟誓塔”不仅是阿佤山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物证,因其丰富的“纪念性”^[19],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连接彼此的功能,亦成为阿佤山各族人民共同构建的精神家园。

(三)历史传承:思想观念与具体行动的实践转向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基于传播行为与整个社会进程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传播“三功能说”,“1. 守望环境;2. 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回应环境;3. 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20]37}区别于拉斯韦尔对传播及媒介的“效果研究”,德布雷的媒介传承论似乎对本文更有理论借鉴意义。媒介学源于人类学,意在关注人类文明延续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德布雷是从思想、观念向力量、行动转换的角度来讨论“传播与传承”的,并将传播看作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体中的片断”,“而这个广泛的集体”称之为传承。^{[14]5}

沿着德布雷的媒介理论轨迹,“歃血盟誓”“垒石成塔”“勒字于塔”分别是特定的、具体的传播节点,而经由“民族团结盟誓塔”形成“歃血盟誓”“垒石成塔”“勒字于塔”的传播链条及传

播过程,则构成了“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历史传承。并且,结合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云南思普大地的民族关系史来看,“民族团结盟誓塔”将“西盟”与“宁洱”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加以连接,形成历史与文化的网络,也将新中国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社会发展成果加以连接,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当年参加“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人大多已经老去、离去,但佤山盟誓的精神却一直伴随“民族团结盟誓塔”得以流传至今。“民族团结盟誓塔”秉持追求永恒的意志,目的在于勾连过往、保存记忆的同时,使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代代相传、传之久远、绵延不息。“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历史传承,不仅仅在于那时那地的人、物、信息的流动,其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经由“民族团结盟誓塔”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推动阿佤人民以言促行,以行践言,将“团结一致,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思想观念不断转化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行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阿佤山各族人民共同信守“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21]的诺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把崇高的信仰转化为奋进动力,不断把坚定的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不断把盟誓的精神转化为实际举措。

(四) 由誓及塔:寻求新的时空平衡

2021 年 6 月,新建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因刻有文字,与书籍、杂志、报纸等媒介类似,倚重文字、图像和人的视觉,其传播是书面偏向的。自此之后,不停有各族群众来到大草地“对塔盟誓”,每一次宣读誓词的过程,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都会相遇在一起,“对塔盟誓”的传播实践能够实现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的瞬间耦合,这也意味着,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尽管传播及媒介偏向不同,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仍能实现短暂平衡。^⑦不过放眼历史,“对塔盟誓”的次数毕竟是屈指可数的,偏向时间的“盟誓”媒介与偏向空间的“盟誓塔(刻字)”媒介的相遇形成的时空平衡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2022 年 10 月,西盟民族团结之歌《盟誓》MV 正式上线,围绕“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历史情境、盟誓场景及时代愿景均得到艺术化再现,

并在互联网平台上广泛传播。“新媒介”(互联网、MV)与“旧媒介”(文字、誓言)、“旧旧媒介”^[16](石头、石塔)有机结合与叠加,不同类型的媒介形式得到不同程度地呈现,“民族团结盟誓塔”的传播方式因此也变得更加多样。在特定的时刻,“歃血盟誓”“垒石成塔”分别以极具感染力的、稳固的传播方式让盟誓精神永久流传,展现出历史性特征,“勒字于塔”以相对正式书面的传播方式使盟誓事件在空间上流布,展现出共时性特征,而互联网平台及其应用则以全天候、永久性、无边界的方式,推动塔以传文、文以载道,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

一言蔽之,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传播模式,新旧媒介的奇妙相遇,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单一偏向的媒介选择已经难觅踪迹。媒介迭代更新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能在空间上无限扩散,也能在时间上经久不灭,“时间与空间二者较之旧媒介更为均衡”^[22]。这样看来,互联网媒介的出现,使得倚重时间的媒介与倚重空间的媒介得以跨越传播的边界,实现新的时空平衡。

三、“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动态传播实践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一) 以塔为媒:“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盟佤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很深。这表现在佤族、拉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也表现在佤族村寨特别是仇家村寨之间,使佤族内部与其他民族间的纠纷和械斗经常发生”。^[147]1950 年 8 月,澜沧县委、县人民政府派解放前先后担任西盟区区长的张石庵、张鸿兴等在阿佤山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前往西盟动员佤族头人赴京参加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观礼。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动员了拉勐、李保、麻哈允、岩汞、岩火龙、岩岛等六人,有的还不是头人。拉勐同意赴京的三个条件分别是交换人质、提供土布盐巴、与刘有兴同行。^[23]^[41]在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背景下,作为媒介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建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德布雷提出,“媒介并不指媒体或介质,而

是指媒介行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24]¹⁷“民族团结盟誓塔”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体”。一方面,作为静态的传播媒介,“民族团结盟誓塔”连接起“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在场的各族群众,使他们及他们的民族同胞(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享大会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作为动态的传播实践,七十多年来,“民族团结盟誓塔”始终调节着阿佤山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阿佤山内与阿佤山外的关系。“民族团结盟誓塔”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它还要对“通过中间项连接的两者起作用”,^[25]在场的各民族群众经由“民族团结盟誓塔”,实现彼此连接、现场互动及相互约束。在“民族团结盟誓塔”的触发和协调下,阿佤山曾经复杂的民族关系因连接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从新中国成立后阿佤山的发展历史来看,因“民族团结盟誓塔”而形成的民族关系新面向、新动态显然是积极正向且不可逆转的。

“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26]从西南民族史来看,阿佤山各族人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与阿佤山各族人民的关系,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阿佤人民一度对汉族及外来民族的疑惧很大,甚至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27]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阿佤山各族人民再次使用“石头”作为隐喻,以“栽石头”及“垒石成塔”的方式“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并发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誓言,而作为媒介的“民族团结盟誓塔”见证了阿佤人民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

在这里,本文并非刻意夸大“民族团结盟誓塔”作为媒介在推动阿佤人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作用,毕竟“媒介”的概念滥觞于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应始于此,而是说,“民族团结盟誓塔”案例表明,“媒介”可以成为分析研究民族融合的一个视角。未来,也许应该更多关注媒介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意义和功能,寻找既往民族关系研究被

遗忘的、被忽视的媒介视角。

(二)塔以载道:“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杜威(John Dewey)明确说过,“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传播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28]¹⁹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也指出,“为将同胞之爱的理想变成现实,人们则需要借助象征符号、仪式和典礼的力量……将共同体中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在一起”。^[29]¹⁹⁷⁻¹⁹⁸若杜威、史密斯对于“传播”与“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关系的理解稍显宏观、抽象,则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的相关论述就很通俗、直白,安德森着重强调了媒介(报纸和小说)及其传播在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虽然安德森关于“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30]⁶的相关讨论在国内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其适用性和合理性遭到一些学者质疑,但是安德森关于“媒介”及“传播”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的相关讨论却是触人深思。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的思考也有启发价值,“没有传播,想象的共同体就没有实现的具体途径”,^[31]晚清报刊“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32]从历史的物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想象体系”^[33]。由此可见,“传播”及“媒介”与“共同体”及“民族共同体”之间确实存在十分紧密的理论关联。

依循费孝通的思路,相关学者亦在“多元一体”的研究路径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34]与中华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强调“共同的民族实体意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35]。回归本文题旨,赴京归来的拉勐、李保在“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上介绍了国庆一周年的盛况,讲述了他们参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昆明等大城市的见闻,宣传了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和新中国强大。拉勐和李保还在大会上宣传了普洱区 26 个民族代表盟誓的盛况,并提议:“今天参加会议

的各民族头人、进步人士和各级领导也要像普洱一样举行剽牛盟誓仪式,每个人抬一块石头擦在一起,以表达决心”。^[36]从历史深处到当下现实,无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垒石盟誓”,推动阿佤人民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国家对各级各类文物日益重视,“盟誓塔”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各族群众再度共享民族团结文化符号,抑或 2021 年新建的“民族团结盟誓塔”成功出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阿佤人民始终通过共通的瞻仰与想象,共享共同的历史经验,这些共同的经验的凝聚不仅使阿佤山各民族同胞之间有了休戚相关、唇齿相依的感受与体验,也使得他们意识到与缅甸佤邦佤族的区隔与差异。经由“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媒介化传播,阿佤人民牢固树立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增进了共同性认知,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从身体力行建塔、守塔、护塔到一心一意践行盟誓诺言、团结精神及爱国情怀,阿佤人民凭借“民族团结盟誓塔”从身体和心理两个维度牢牢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对塔盟誓:“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凯瑞(James W. Carey)看来,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37]¹²无论是作为“垒石成塔”建筑材料的石头,还是作为“垒石成塔”成品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均为坚硬的物质,具有高大、笨重、耐久的媒介属性,媒介性质相对稳定,其承载信息、存储信息、传递信息的媒介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歃血盟誓”同传说、神话、史诗等相似,是人类传播史上典型的口头传播活动,语言轻便,极具感染性,富有号召力。而“勒字于塔”使“民族团结盟誓塔”具有文字传播的特征,且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歃血盟誓”“垒石成塔”“勒字于塔”等传播过程促使“民族团结盟誓塔”分别形成口头传播、实物传播、文字传播等传播形态,再经由书籍、音乐影片、互联网平台等传播媒介推介,进而形成“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完整传播过程。“民族团结盟誓塔”的跨媒介化传播过程,一方面,使其成为偏向时间的媒介,阿佤山

“垒石盟誓”事件得以在时间中纵横穿越,在历史岁月里绵延不辍,阿佤人民可借此重新捕获已经或即将失去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其成为偏向空间的媒介,跨越地域空间,将“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信息内容尤其是“团结一致跟党走”的民族团结内容传至远方,推动“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信息、观念、思想在空间范围内广泛流布。因此,不管是作为记录性媒介,还是作为传输性媒介,“民族团结盟誓塔”始终传递着“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域文化信息,且以媒介化的方式不断记录和书写着阿佤山的历史。

然而,“民族团结盟誓塔”隐含的传播观还包含丰富的“仪式观”意义。在“民族团结盟誓塔”传播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剽牛盟誓”,“历史上佤族部落与部落之间或部落内部往往因某种特定原因或突发事件而进行临时性的结盟,因此必须举行隆重(剽牛盟誓)仪式”,^[38]¹⁸⁸“盟誓有特定的仪式,主要借助神灵的力量,兼及道德约束,制订出双方或多方必须遵守的誓约”,^[39]³⁷“歃血盟誓的仪式过程伴随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影响着仪式参与者的心灵”^[40]。“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剽牛盟誓仪式蕴涵着深刻的“阿佤理”,按照佤族、拉祜族的传统和规矩,其仪式大致分为泡水酒、剽牛、喝咒水、垒石、发毒誓等环节,而杀牲歃血的原始宗教仪式,往往与佤族的宗教活动、占卜及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前述分析,献牲、祈咒、盟誓、立塔等传播现象,构成了复杂而精细的仪式过程,“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建立及形成明显充满“仪式传播”^[41]色彩。七十余年间,时常有阿佤山各族群众来到大草地举行纪念活动,注目瞻仰“民族团结盟誓塔”,高声宣读盟誓誓词。“对塔盟誓”因此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阿佤人民“召集在一起”,形成的“神圣典礼”使阿佤山各族人民也紧紧凝聚在一起,进而“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37]¹⁶新时代以来,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群众也纷纷来到这块草地,面对“民族团结盟誓塔”,重温“民族团结誓词”及“盟誓塔誓词”,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延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民族团结盟誓塔”因此存在于“历史

性”的时间中,佤山盟誓也得以持续生产、维系、修正及改造。

四、结语

“民族团结盟誓塔”是我国民族地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民族关系调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探讨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固然与媒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聚焦“民族团结盟誓塔”的传播议题,“民族团结盟誓塔”又有十分丰富的传播意义。当然,本文并非简单地使用西方传播理论来解读中国实践,因受媒介技术变迁及中国本土媒介实践特殊性影响,西方的传播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民族团结盟誓塔”案例,其中理论阐释力与理论张力并存。基于这样的学理讨论,能够较为全面地关注到多元的媒介形态,进而深化对中国特色传播实践的认识。同时,“民族团结盟誓塔”及其传播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其自带的媒介属性及其传播过程亦能成为后续相关研究讨论的起点。

现阶段,“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研究存在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和宏大叙事多这三多特点。相应的,事实调查、个案积累和深入分析这类经验研究则显得相当的不足”。^[42]在对云南西盟“民族团结盟誓塔”进行传播学阐释的基础上,本文意图进一步回答“特定类型的‘媒介’何以连接‘民族’及其传播如何勾连民族关系”这个“元问题”。“民族团结盟誓塔”特定的传播实践,不仅之于特定的民族历史事件具有记录、保存及传承功能,见证民族关系历史的沧桑变化,其象征意义及不朽属性在当前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也富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这样的个案探索和经验研究并非没有推广的价值,这一点从“民族团结誓词碑”的传播实践中亦可得到印证,这也是“如何走出个案”^[43]所提倡的。

近年来,不少传播学学者站在“功能主义”角度,分析传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联系,重点讨论传播格局的发展与变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巨大冲击,从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等不同面向研判传播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作用,想要通过“传播”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有别于既往相对“务实”的探讨,

本文究其一点,从传播理论视角探讨我国民族地区具体的政治物象,考察其作为一种媒介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的动态实践过程,这对于充分激活和有效运用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映照现实,“传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注释:

①2022年9月12日至30日,本文作者之一到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思茅区、西盟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开展田野调查。相关资料根据对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地方史志办公室、佤族文化研究会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访谈整理所得,在此感谢罗中琼、钟磊、岩玉等人接受访谈。

②参见中共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红色誓约——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七十周年》,载内部资料,2021年版;苏然编:《拉勐故事与拉勐精神》,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版;光明网:《阿佤山滇池畔续写民族团结誓词碑》, https://difang.gmw.cn/yn/2020-01/20/content_33498332.htm, 发文日期:2020年1月20日,引用日期:2024年4月19日,等。

③该图由本文作者根据2022年9月20日拍摄的实景图绘制而成。

④2022年10月17日至10月21日,本文作者之一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同事赴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开展田野调查,这部分资料由“班洪抗英纪念馆”提供。

⑤相关资料根据本文作者之一对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民宗局、方志办、社科联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访谈整理所得,在此感谢罗中琼、陆佳柱、钟磊、苏然等人接受访谈。至于1980年代的盟誓塔,民间与官方说法存在差异,本文按下不表。

⑥本文作者之一根据对西盟县佤族文化研究会会长岩峰的访谈资料整理,2023年1月11日访谈。

⑦伊尼斯对媒介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广义上

的界定,既包括电报、电影、广播等经典媒介,也包括口语、文字、莎草纸、黏土、石头等媒介,甚至将金字塔、纪念碑、喇叭等承载信息的物质均视为媒介,并在《帝国与传播》等论著中对传播及媒介的偏向作了明确表述,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可以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相关论述可见:[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等。

参考文献:

[1]罗之基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盟县佤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编著.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黄桂枢.思茅文物考古历史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4](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潘祥辉.“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05):30-46+126-127.

[7]白娜.佤族盟誓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品格[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7(05):1-4.

[8]白描.阿佤山誓言[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1-25.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盟佤族自治县委员会编.红色基因代代传 民族团结谱新篇——西盟县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资源普查报告[M].西盟佤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第七辑),2022.

[10]西盟佤族自治县文化馆编著.西盟佤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普洱县委员会编.民族团结誓词碑史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12][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三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1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本)[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14][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15]刘祚臣.古塔史话(中国史话·物化历史系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6][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17]郑承铨.说文解字叙讲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8]赵建国.实体传播与传播分类探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6(04):92-96+110.

[19][美]巫鸿.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的“纪念碑性”和“反纪念碑性”[J].中国艺术,2010(01):24-27.

[20][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1]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J].云岭先锋,2021(09):4.

[22]李沁.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J].国际新闻界,2015,37(05):6-22.

[23]思茅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团结的丰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24][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M].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5]黄旦.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与历史[J].探索与争鸣,2022(01):142-148+180.

[2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3-21.

[27] 普洱发布. 绿色发展看普洱 | 栉风沐雨 70 余载 这座丰碑熠熠生辉 [EB/OL]. (2023-01-08) [2024-11-13]. <https://mp.weixin.qq.com/s/oMeSmEpViZP9i6lVRfd9Ig>.

[28] [美]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9]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 民族认同 [M]. 王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30]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增订版) [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31] 郭建斌, 苏涛. “民族”与“传播”: 一种概念层面的辨析 [J]. 新闻界, 2021 (09): 14-25.

[32] 姜红. “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5 (01): 136-144.

[33] 郭淼, 檀晓涓, 赵永波. 基于物质的传承与想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媒介学审思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4 (01): 39-45.

[34]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J]. 民族研究, 2018 (01): 1-8+123.

[35] 严庆. 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版), 2017, 38 (03): 46-50.

[36] 今日民族. “活着的”纪念碑: 民族团结誓词碑之后的故事 [EB/OL]. (2021-04-01) [2024-11-13]. <https://mp.weixin.qq.com/s/YZF3ZtCWBgddshLetvyA1w>.

[37] [美] 詹姆斯·W.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M]. 丁未,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38] 周本贞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佤族卷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4.

[39] 田兆元. 盟誓史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40] 张泽洪. 论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宗教文化内涵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3 (02): 13-19.

[41] 郭建斌, 程悦. “传播”与“仪式”: 基于研究经验和理论的辨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 27 (11): 21-36+126.

[42] 何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 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3 (01): 5-14.

[43] 卢晖临, 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01): 118-130+207-208.

收稿日期: 2024-08-11 责任编辑: 贾海霞

Dynamic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Tower as a Medium

Guo Jianbin¹, Nian Pengfan²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2. Information Center,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Yunnan, China)

JOURNAL OF ETHNOLOGY, VOL. 15, NO. 11, 107–117, 2024 (CN51–1731/C, in Chinese)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4.11.012

Abstract: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was formed in the “Ethnic Unity and Home Protection and Country Defense Conference of Wa Mountain” in Ximeng of Yunnan on January 21, 1951. It is considered as a quite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the Wa Mountain people’s 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alist new China transitioning from a late primitive society and early slave society, and expressing their gratitud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and apply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practice of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as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ath Tower” as both a medium and intermedi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surrounding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ree key phases: “Blood oath” as an oral communication act, “building of the stone tower” as a form of material or entity communication, and “words in the tower” as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types related to “Oath Tower” appear to be multifaceted, including: 1) Entity communication, which bridges oral and textu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2) architectural media, where the physical structure serves as a continuous intersection between material existence and intangible significance; 3) historical inheritance, representing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into tangible actions; and 4) the transition from oath to tower, representing the search for a new space-time balance. These discussions show rich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arguably demonstrate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discourse, we can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he diversified media forms,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and it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re the products of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its inherent media attributes and communication dynamics present opportunities for subsequent relevan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is a valuab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thnic areas of China,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ethnic rel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Therefore, through the le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pplied to the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meta-question” of “how certain types of” media “can connect with” ethnicities and “how can these communications be relevant to ethnic rela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ynamic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in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lies in the following: i) The tower is used as the medium for “integrating” the diverse ethnic groups into the big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i) the tower is regarded as a carrier of the “concept” of being “embedded” in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ii) and the tower is an object of oath that has “spread” the idea of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specific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this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moreover, appears to serve a dual function: It records, preserves, and transmits specific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while also bearing witness to the vicissitudes in the history of ethnic relations. In short, its symbolic meaning and enduring attribute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urrent cause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n China.

Key Words: Ethnic Unity Oath Tower; communicatio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meng